

# 編者序言

黃俊傑

近數十年來，不論在中國或在西方世界，史學研究的發展以及史學知識的價值普遍受到了阻礙與懷疑。就歐美而言，自一九三〇年代以降「歷史相對論」大興，歷史知識的客觀性與絕對性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在史學研究的陣營中，二十世紀史家皆一反十九世紀以來樂觀自信之論調，而普遍表現一種迷惑悲觀之心態。往史已矣，即竭學生之力亦難究其原委；來者莫測，縱能稽考舊史之遺跡亦無以推測其突變。二十世紀史家此種謙虛而悲觀的論調隨兩次大戰之災難、戰役變幻之世局而日趨悲涼。

與當代史家此種悲觀心態相終始者則是當代西方文化中歷史意識之不彰。一九六九年，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伍瓦德（C. Vann Woodward）氏在其會長演說辭中，就指出一般人之歷史興趣低落，而在其他人文學科中，史學解釋亦不受重視。凡此皆反映當代西方文化中之反歷史偏見之一斑。伍氏在十年前所指的現象迄今並無改變。今年（一九七九年）春初，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教授聘克尼（David H. Pinkney）氏在其被提名競選一九八〇年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已當選）之「政見」中，即呼籲史學工作同仁注意當前高等教育中缺乏歷史意識之趨勢。作爲一個史學工作者，伍瓦德與聘克尼兩氏此種「危機感」與近數十年來史學知識在歐美地區之受到懷疑的潮流是無法分開的。

相對於西方而言，中國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歷史感的國家。但是這種源遠流長的歷史意識與史學研究的興趣最近却受到了至少兩種不同因素的影響而有衰微或轉變的趨勢。一是由於工商業的發達而帶來的

功利主義的狂潮。工商社會崇貨財而羞貧賤，重近利而輕遠圖。在此種社會背景之下，史學知識不復爲世所重，史學研究亦遂被視爲無用之學，二千多年前司馬遷（西元前一四五—八六）即曾有史學爲「流俗之所輕」之言，此種慨嘆至二十世紀工商大興之時代而取得嶄新之意義。二是爲尋求政治運動的歷史根據而引發的追索歷史之浪潮。自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以降，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者多欲以古證今，從史中尋求其政治運動的基礎。此就其改革運動者之立場言，不僅無可厚非而且歷史之素養反可開擴其爲政之心胸；但史學研之立場言，此種風潮自表面觀之似有助於史學興趣之提高，然自其深層觀察，則史學研究因爲政治動之婢女而盡喪其作爲獨立學術之尊嚴與價值。此種風潮對史學研究之危害殆不在功利主義之下。功利主義者根本否定史學存在之價值；政治運動者則欲使史學爲現實作無條件之服務。兩者取徑不同，然其有害於史學研究則若合符節。在以上二種因素交互影響之下，近代中國史學研究所遭遇之個別問題固與西方史學不同，然其發展之受到阻礙則毫無二致。

生乎世變日亟而史學衰落之時代，吾人欲求史學研究之重振，其事固複雜萬端，未易從事，然史學方法論之講求殆爲一可行之途徑焉。民國以來，國人之講求史學方法者頗不乏人，五四以來所謂「科學方法」之呼聲更是震天價響，甚囂塵上。然吾人細按其言論，終覺不免求之太過，其末流所至，遂不免趨於極端，馴至以方法代史料，以「理論」代思考，迷信「科學」爲萬靈之仙丹，以所謂「科學方法」爲屠龍之神技。故其說頗引起相對之反響，反方法論者頻出自不足爲怪矣。

民國以來之反方法論者持論殆不出以下之二途。或就一般治學歷程之艱辛反對方法論之刻意講求，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先生及余英時先生之言最足爲其代表，熊先生曰：

每見青年問學，開口必曰方法，此極可惜。須知學問方法，必待學成而後能明其可以。至球學時代，則全仗自家一副精心果力，暗中摸索，方方面面，不憚繁難，經歷許多層累曲折，如疑惑、設計、集證、決斷、會通、類推等等，其間所歷困難與錯誤，正不知幾許。窮年屹屹，而後有成。一旦豁然，回思經歷，方自見有所循之方法，可舉以告人者。（見：十力語要，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一年影印本，卷四，頁五六—五七）。

余英時先生之言曰：

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耐心地摸索。（見：氏著，「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詞」，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或特就史料在史學研究之重要性著眼，反對方法論之講求，以為史學築基於史料，故辨證史料考覈真偽則史家之能事畢矣。因此，史學工作者之首要任務乃在於「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之踏實工夫，而不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空疏理想。持此論者即於研究方法有所講求，亦僅以考證史料真偽之方法為已足，與一般所謂方法論所見固有廣狹之分矣。

以上從一般之治學經驗或從史學之特殊性質所提出之看法皆有所見，但實際上都不應該獲致方法論不應講求之結論。史學研究以史料為其基礎，史學解釋亦通過對史料之疏解而提出，故史學知識有其經驗性之基礎，此皆人人共論之義。吾人如捨棄史料空言方法，妄欲建立歷史發展之普通模式，則如孟子所言：「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對研究工作非僅無益，且適足以害之。然

吾人此處所云之方法論，乃是指史學研究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摸索所得有關史學研究之通則與技術。史學方法論代表研究工作者與研究對象在永無終止的互動過程中所形成之通則。徐復觀先生說：「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對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對象向研究者所呈現的答覆，綜合在一起的一種處理過程。」（見：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台中：中央書局，民國四十八年，頁一一二）史學工作者對這種處理過程的自我反省愈深刻，則其研究工作亦愈易臻於理想。此所以史學方法論之不可不講求也。

當然，言之成理的一套方法論絕非憑空可得。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嘗自云其良知之說乃「百死千難」中得來，方法論轉成過程之艱辛每有若是者。辛勤之研究工作形成方法論，而方法論亦可反過來刺激史學工作者對研究工作再思考之工夫。研究方法與研究工作絕不分爲兩橛，兩者之交互作用正是史學研究境界不斷提昇之基本動力。

本書之編輯，即係根據上述對方法論之基本認識，就民國以來國人闡釋史學方法之文字中，選其議論諦當，足供吾人參考者，輯成專書。其意一則藉此回顧近七十年間國人檢討史學方法論既有之業績，反省過去乃所以展望未來；二則自各個不同研究角度，彰顯方法論之重要性，以作爲吾人反省研究工作之一助緣也。

職是之故，本書選錄論文殆可大別爲二大類屬。「通論篇」部份收錄梁任公以降，國人論述史學方法之一般性質文字十四篇，各篇論述取徑不同，然皆不出史學工作之基本性質及史學研究之基本方法二端，而以「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一文冠於全書篇首，則取其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不以國史研究劃地自限，冀求比較會通中西歷史之微意焉。「專論篇」部份收錄國人論述專門史研究方法之文字十四篇，

各就社會科學、校勘學、歷史哲學、思想史、近代現代史、外交史、經濟史、宗教史、歷史人口學、戲劇史之立場，申論其特殊領域之研究方法。此一部份選文之目的乃在透過不同角度彰顯方法論之重要性。「專論篇」各文皆在不同程度內觸及史學研究之自主性之問題。此爲史學方法論之一重大基本問題，爲吾人所當留意。史學固不斷從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中汲取養分以豐富其生命，然此非意謂史學必然淪爲社會科學之附庸。明乎此，然後可以語於史學研究之獨立性與自主性。

今日乃至明日之中國史學家所肩負之責任百十倍於往昔。就傳統中國史學家而言，考究天人、疏通古今，則史家之能事畢矣。然今日中國史家承百代之後而會乎當世之變，除以上二項傳統職責之外，尙負有融會中外史學之現代使命。東西文化與學術之交會與融通，已構成爲當今人類之重大課題，史學爲學術之淵藪，史學家自不能亦不可自外於此一任重道遠之學術挑戰。然則，考究天人、疏通古今、融合中外，在在皆有資於方法論之講求。此本書之所以編輯也。至於取捨失當，排比有闕，尙祈大雅君子不吝教正。

己未仲秋，於西雅圖

華盛頓湖畔